

引入政治文化情境：民主认知测量的新思路

胡 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民主认知是民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众的民主认知对于了解民主理念的扩散和推进民主制度的落地有着重要意义。既有研究存在两种测量民主认知的思路：一种假定民主具有确定含义，然后在问卷中设定选项请民众选择和确认；另一种则通过开放性问题搜集民众的回答，然后进行归类和分析。“假定—验证”思路和“归纳—分类”思路遭遇的共同挑战在于研究者自身的预断会影响经验证据的搜集和分析。为此，应将政治文化情境带入民主认知的测量和研究之中：研究者应进入研究地区的政治文化情境之中，了解当地的政治文化和话语对民众民主认知的影响；接着了解民众用来指代和形容民主的词汇和话语，分析民主在当地文化情境下的含义。文章以中国为具体案例，展示新思路如何有助于对民众民主认知的探索和研究。通过引入政治文化情境，研究者可以设计更具信度和效度的民主认知测量指标，得出更切实际的结论。

关键词：政治文化；民主认知；概念测量；混合方法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 (2021) 12-0212-08

民主政治的推进和生根离不开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林茨和斯泰潘认为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则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并且这一政府事实上拥有制定新的政策的权力。简而言之，即民主成为“在场唯一的游戏规则”（the only game in town）。^①所有的政治行为者都只会在民主框架内开展政治博弈和互动，而不会试图推翻之或者建立新的规则。与强调政治精英的价值偏好、话语、互动模式的研究不同，阿尔蒙德和维巴开启的公民文化研究将目光从政治精英转向普通民众，认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更多的是普通民众自下而上自主选择和实践的结果，民众的政治态度因而成为研究关注的对象。^②

二战后，民主成为主导性的世界思潮。^③根据1995—1997年和1999—200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ZZ012）。

作者简介：胡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

① 胡安·J. 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 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Ronald Inglehart,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Filippo Sabetti, “Democracy and Civic Culture”, in Carlex Boix and Susan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ristian Welzel, Ronald Inglehart, “The Role of Ordinary People in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9, No. 1, 2008, pp. 126-140.

③ 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尹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据，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很好或非常好。在中位国家，至少 92% 的民众给予民主正面评价。^① 然而学者们很快发现，这些声称的支持可能是敷衍式的回答（lip service），即民众可能并不知道民主的真实含义为何，就选择支持。^② 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体都会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区别在于在民主前面加了什么类型的修饰词以及如何界定其声称的民主。有学者发现，一些民主的程序安排，如选举、代议制度被威权统治者借用来巩固自身的统治。^③ 还有的国家和地区，外人评价为威权政体，本国民众却认为自己身处在一个民主国家，或者对本国的民主状况感到满意。布莱登和梅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民主支持，一种将民主视为值得肯定的价值，另一种将民主视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有力工具。^④ 这些现象促使学者开始关注民众的民主认知（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⑤ 没有对民主认知的考量，对民主支持（support for democracy）或民主偏好（preference of democracy）的研究将无从谈起，因而研究民众的民主认知对于了解民主理念的扩散和推进民主制度的落地有着重要意义。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在测量方式、指标设计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做法和观点，导致经验发现和结论也十分不同。本文将首先回顾既有的测量方式，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以中国为例展示新思路的启发，结论部分将对测量民主认知的新思路进行总结。

一、既有的测量方式

既有的测量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可称之为“假定—验证”思路：研究者首先确定民主的要义为何，然后在问卷中设计相应的场景或者选项，请研究对象判断或选择，接着将搜集到的回答与研究者的民主体义进行匹配，分析和判断研究对象的民主认知。在非洲晴雨表调查（Afrobarometer Survey）中，研究者设计了一些具体的情景状况，请研究对象判断其是否为民主。在其他的调查中，研究者提供不同的民主体义选项，请研究对象进行选择。如世界价值观（World Value Survey）调查从第五波开始即设计了如下问题：

许多事都是好的，但不是所有好事都能称之为民主。请告诉我下列事项中哪些是民主的要义。1 表示“不是民主的要义”，10 表示“是民主的要义”，请逐个选择：

V152. 政府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

V153. 宗教权威解释法律

V154. 人们自由选举领导人

V155. 国家为失业者提供援助

V156. 军队接管无能政府

V157. 公民权利保障人们免受压迫的自由

V158. 经济繁荣

① Ronald Inglehart, “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6, No. 1, 2003, pp. 51–57.

②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4, 1988, pp. 1203–1230; Larry Diamond, “Introduc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How People View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Steven Levitsky, Luci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2002, pp. 51–65; Jennifer Gandhi, Adam Przeworski,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1, 2007, pp. 1279–1301.

④ Michael Bratton, Robert Mattes,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3, 2001, pp. 447–474.

⑤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eds., *How People View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Andrew J. Nathan and Doh Chull Shi,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V159. 罪犯得到严惩

V160. 人们能够通过公投改变法律

V161. 女人和男人享有同等权利^①

全球晴雨表调查 (Global Barometer Survey) 中也有类似的问题。以亚洲晴雨表调查 (Asian Barometer Survey) 为例, 第二波问卷调查中, 研究者设计了如下问题测量研究对象的民主认知:

Q92. 在民主的核心要义上, 人们常常有不同的观点, 对您来说, 以下哪个选项符合您心中民主的核心要义?

1. 拥有通过选举变更政府的机会
2. 批评当权者的自由
3. 贫富差距不大
4. 所有人都能有衣、食、住等基本保障^②

在第三波和第四波亚洲晴雨表调查中, 问题的设定发生了变化。增加为 4 组选项, 请研究对象在其中选择:

Q85.

1. 政府减少贫富差距
2. 人们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中选择政府领导人
3. 政府不浪费公帑
4. 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新)

Q86.

1. 立法机关能够监督政府
2. 所有人都能有衣、食、住等基本保障
3. 人们能够自由地组织政治团体
4. 政府为民众提供有质量的公共服务

Q87.

1. 政府执行法律、提供秩序
2. 媒体能够批评政府
3. 政府保证所有人都有工作机会
4. 选举中多党竞争

Q88.

1. 人们拥有参与集会游行和抗争的自由
2. 政治清廉, 没有腐败
3. 法院保障民众不受政府滥权的侵害
4. 政府为失业民众提供援助^③

在针对中国民众的研究中, 张明澍设计的问题为:

你觉得下面对民主的说法, 哪一种比较接近你对民主的理解? (单选)

1. 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 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
2. 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 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为人民服务, 要受人民的

^①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访问时间: 2019年12月20日。

^②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data/core-questionnaire>, 访问时间: 2019年12月20日。

^③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data/core-questionnaire>, 访问时间: 2019年12月20日。

监督^①

卢春龙认为民主具有三条核心价值：（1）一切主权属于人民；（2）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权利；（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在三条价值上分别设置不同的说法，请研究对象逐一给予评价，选项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楚”“同意”和“完全同意”。如在第一条上的选项为：

1. 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
2. 政府的决策应该尊重人民的意志，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3. 政府的信息应该对人民公开^②

从上述的列举中可以看到，研究者们设计出了不同的选项，这显然会导致不同的发现。如张明澍的调查中，84.7%的中国研究对象选择了第二个选项。^③ 辛道辙（Doh Chull Shin）认为亚洲晴雨表调查中蕴含着两个维度的民主认知：程序性的维度（procedural dimension），具体包括规范和程序、政治自由；实质性的维度（substantive dimension），具体包括社会平等、善治。在辛道辙看来，不管如何，民主的核心包括选举参与、政治竞争以及自由表达和结社。如果无法将其识别出来，那么就是对民主的误解，或者不够了解。亚洲晴雨表调查显示：中国的研究对象，能够完全了解或十分了解民主概念的只有15%，不了解和不太了解的则高达60%。^④ 很明显，两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假定—验证”思路推动研究进步、知识积累的前提在于学者们能够对民主是什么有一个基本共识。但遗憾的是，围绕民主的界定，学界本身就存在不同看法，即使是民主理论家，也为此争论不休。^⑤

第二种方法可称之为“归纳—分析”思路，即学者们放弃预先假定民主是什么，而通过访谈或者在问卷中提供开放型问题，总结并分析研究对象的回答，了解其民主认知。光磊（Lei Guang）通过分析1980年代学生的话语区分不同类型的民主认知。^⑥ 彭亚莉（Yali Peng）利用Q方法分析民众的民主话语。^⑦ 刘伟分析研究团队搜集而来的访谈材料，展示农村居民对民主的多元理解。^⑧ 一些调查问卷中则设置了开放性问题。例如在第一波至第二波亚洲晴雨表调查中，有一个开放性问题：

Q91. 对您而言，民主意味着什么？（开放性问题，最多允许三个回答）

开放性问题有利于研究者了解研究对象的话语和想法，减少因研究者自身的既有认知所带来的“测量偏差”。但这种思路也存在一些挑战：其一，无论是访谈还是问卷调查，不提供提示和选项可能会出现较多的“不知道”回答。布莱登等学者在非洲进行的调查，无法对民主含义提供有效回答的研究对象比例是22%。^⑨ 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比例更高。第二波亚洲晴雨表调查中，43.5%的研究对象无法提供有效回答；在2008年、2009年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进行的中国公民意识调查中，无回答或不知道的比例高达55.5%和59.02%。较高水平的无回答和不知道会对学者的分析造成挑战，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无回答”和“不知道”是否意味着这些人就没有民主认知？一些研究对象可能在开放型问题中回答不知道，但当有选项后又能给出选择，这样的民众是否有民主认知？如何解读？其二，开放型问题的回答往往十分丰富、多样，如何归纳及解读，见仁见智。布莱登等人通过分析非洲的

① 张明澍 《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② 卢春龙 《新兴中产阶级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立足中国国情的民主价值观》，《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张明澍 《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57页。

④ Doh Chull Shin, “How Ordinary People in East Asia React to Democracy?”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演讲报告，2019年11月。

⑤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⑥ Lei Guang, “Elusive Democracy: 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1978-1979 to 1989,” *Modern China*, Vol. 22, No. 4, 1996, pp. 417-447.

⑦ Yali Peng, “Democracy and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s,” *Modern China*, Vol. 24, No. 4, 1998, pp. 408-444.

⑧ 刘伟 《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透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8-75页。

⑨ Michael Bratton, Robert Mattes, E. Gyimah-Boadi, *Public Opinion, Democracy, and Market Reform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6.

数据,将回答从积极和消极意义方面分为两大类,其中积极含义部分包括“自由”“大众参与”“政治权利”“和平和统一”“平等和正义”“经济社会发展”“善治”等类别。研究者们发现多数的民众将民主视为保障自由和参与的制度安排,结论是非洲民众的民主认知与普世认知无太大差异。^① 在对中国民众的认知分析中,史天健在早期的作品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民主认知:社会主义民主、经典的儒家贤能统治思想、自由民主。^② 他和合作者后来又将其整合成两种类型的民主认知:强调程序正义的自由民主、强调实质正义的卫护型民主(guardianship democracy)。^③ 史天健等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民本思想显著影响了民众的民主认知,相当多数的民众将民主理解为民本,即只关心结果而不关心过程。^④ 而在布莱登等人看来,民众可能既从程序角度也从实质角度理解民主。^⑤ 很明显,到了分析解读阶段,研究者自身的预断和价值观又显现了出来,影响研究结论和判断。

二、政治文化情境的引入

有趣的是,虽然测量方法不一,且得出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诸多学者却都强调文化情境对民主认知的影响。辛道辙得出的结论是儒家文化传统使得东亚民众更容易接受威权式的政府,英格尔哈特等人主张的经济现代化推动公民文化及民主的兴起的观点在东亚并没有出现。^⑥ 史天健也认为儒家文化并没有消失,相反,其能够独立于经济社会变迁,有着自己的生命活力,影响包括民主观在内的民众政治态度,并为当下的政体提供正当性基础。^⑦ 张明澍也认为中国民众更偏好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民主定义,而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民主体义。^⑧ 卢春龙强调自己的选项设置符合中国国情。^⑨

“假定一验证”思路试图用一把尺子来测量全球各地民众的认知,“归纳一分析”思路却发现各地民众眼中的尺子标准并不相同。与研究结束才发现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同,本文主张在研究前即承认并重视一地政治文化情境对民主认知的影响。这源于政治文化并非个体观念的集合,而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为政治提供意义的集体存在。^⑩ 作为一种集体存在,政治文化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产物,并具有长久的持续性。在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政治文化并不因某一个体的态度变化而改变,相反,个体往往诞生于这种集体性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政治文化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人际交往、媒体等机制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史天健提出了文化影响政治后果的五条机制:影响行为者如何理解社

① Michael Bratton, "Anchoring the 'D-Word' in Af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pp. 106-113; Michael Bratton, Robert Mattes, E. Gyimah-Boadi, *Public Opinion, Democracy, and Market Reform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8-72.

②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et al.,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Tianjian Shi,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pp. 123-130; Jie Lu, Tianjian Shi, "The Battle of Ideas and Discourses before Democratic Transition: Different Democratic Conceptions in Authoritaria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6, No. 1, 2015, pp. 20-41;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Tianjian Shi,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pp. 123-130;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⑤ Michael Bratton, Robert Mattes, E. Gyimah-Boadi, *Public Opinion, Democracy, and Market Reform in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8-72.

⑥ Doh Chull Shin, "How Ordinary People in East Asia React to Democracy?" 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研究中心演讲报告, 2019年11月。

⑦ Tianjian Shi,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pp. 123-130;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ter 7.

⑧ 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57页。

⑨ 卢春龙《新兴中产阶级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立足中国国情的民主价值观》,《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

⑩ 胡鹏《政治文化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会行为的意义、提供评价他人行为的标准、提供影响他人的资源、确定行为者在特定环境内可以合理追求的目标、形塑行为者追求特定目标的手段。^①

民主涉及政治体制的根本安排，现实中各个地方均存在有关民主和政治体制根本安排的意义体系和系统论述，政治文化因素因此不能被忽视。既有的民主认知研究遵循的是公民文化开创的“从个体推广到集体”的思路，即以问卷调查了解个体的政治态度，然后集合起来推断整体的情况。笔者的新思路是：首先，研究者需了解民众所处的政治文化情境，关注并总结诸如官方话语、文化传统、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等集体现象，了解哪些意义和话语体系可能影响民众的民主认知；接着，需要了解个体的观点和态度，进入民众的话语体系之中，了解其使用什么术语来指代民主；最后，需要进行多重对比来得出研究结论，如将个体的态度和认知与集体性的话语体系进行对比，将搜集的经验材料与学理上的概念讨论进行对比，将本地的认知与其他地区的认知进行对比，等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其一，我们可能会发现，在特定政治文化环境下，民主的含义多样或者发生了变化。光磊发现，民主在中文语境中存在四种潜在的不同含义。^② 谢弗（Frederic C. Schaffer）发现在塞内加尔，民主一词往往反映了民众对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的考量，而非竞争性选举或其他。^③ 其二，因为政治文化提供了在此情境下的普遍的意义论述，对其的把握和了解可以增进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话语和认知的了解，帮助研究者设计出更好的测量指标和问题。李连江通过分析在京上访者的访谈记录，发现民众对中央的概念理解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同，基于重新设计的问卷问题，他得出了新的结论和发现。^④ 其三，在分析和解读时，了解政治文化情景能使研究者更少地被自身既有的价值判断所影响，分析和解读更符合研究对象所表达的含义，减少可能的偏误。一些本身含义就多元、存在多种可能解读的词，如“自由”“善治”到底是什么意思，需要在当地的政治文化情境下进行把握和判断。

三、来自中国的经验材料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文化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官方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占据主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对中国民众的民主认知的分析，首先应该立足于了解民众所处的政治文化和话语情境。上述三种思想话语体系中的民主含义各不相同，笔者首先进行梳理。在西方民主话语方面，目前占据主导的是自由民主理念。熊彼特给出了经典的民主界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⑤ 达尔给了一个更加易懂的判定：多头政体（即民主）由政治竞争加大众参与组成。^⑥ 当然，达尔不忘强调，民主的关键特征是“政府不断地对政治平等的公民的诉求做出持续性的回应”^⑦。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政治制度和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有系统论述：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并不平等，统治者为有德者居之，同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也非常关键，“民本思想”贯穿其中。^⑧ 虽然统治者的正当性来自于超自然（上天），但良善统治的目标在于维护

①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4–36.

② Lei Guang, “Elusive Democracy: 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1978–1979 to 1989,” *Modern China*, Vol. 22, No. 4, 1996, pp. 417–447.

③ Frederic C. Schaffer, *Democracy in Translation: Understanding Politics in an Unfamiliar Cul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Lianjiang Li, “The Magnitude and Resili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er: Evidence from Interviews with Petitioners in Beijing and a Local Survey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9, No. 1, 2012, pp. 3–36.

⑤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

⑥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16页。

⑦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页。

⑧ Doh Chull Shin,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和关照民众的福祉,聆听民众疾呼、回应民众诉求也成了应有之义。^①民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其中,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②人民民主专政话语意味着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则实行专政。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依据阶级地位来界定人民,而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含义逐步转变为一个法律概念。2005年由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写道: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范围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社会主义民主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民主政治的设计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③在领导人的讲话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④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儒家思想、西式自由民主话语的相同之处在于均强调统治的目标在于维护民众的福祉和利益、主张政府倾听并回应民众的意见和诉求。但三者也存在显著的不同: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强调人民主权、鼓励民众的参与,儒家思想则主张君权天命和士大夫精英政治;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强调民主参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西式自由民主则主张政治竞争。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思想,了解此政治文化情境对于我们分析问卷调查中有关民主的开放性问题的回答有显著的帮助。笔者对民众民主认知的经验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一方面分析2008年、2009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以及第二波亚洲晴雨表调查中有关民主认知的开放性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对普通民众展开有针对性的访谈,力图将访谈材料和问卷调查数据结合起来。三个全国性的问卷调查数据提供总计7193条有效回答,笔者归类出以下八类不同的民主认知:自由、权利、平等公正、经济社会状况、人民当家作主/说了算、决策方式、选举投票、参与提意见和回应。下表展示了八个分类及其代表性回答。

三波问卷调查所得回答的分类

	代表性回答
自由	自由、个人自由、人民自由、自由自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民有自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权利	权利、公民权利、民权
平等、公正	平等、人人平等、公正
经济、社会状况	老百姓过好日子、生活变好、贫富差距变小、人民富裕、社会好、团结稳定
人民当家作主/说了算	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作主、自己当家作主、农民作主、人民群众、老百姓说了算
决策方式	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大家一起商量、公开、少数服从多数、村民决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采纳多数意见
选举、投票	投票、选举、普选、人民说了算、选干部、村民选村长
参与、提意见、回应	老百姓提意见、群众有发言权、政府征求群众意见、政府多听老百姓意见、听取人民意见、参政议政、群众在公共事务上有发言权、政府考虑群众利益
其他	思想、政策、社会、祖国、法制等

在这些类别中,“自由”“人民当家作主”“参与、提意见和回应”是占比最多的三类含义,比例分别为21.36%、18.94%和13.99%。由此可以得到如下发现和启示:其一,民众心中的民主含义丰富多样,既有研究和问卷中提供的含义选项可能未必是民众心中所想,“假定—验证”思路有效的

① 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夏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② 李铁映《论民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③ 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http://www.gov.cn/2005-10/19/content_79553.htm,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④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15/c_1124998129.htm,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0日。

前提在于了解民众心中的民主概念为何。其二，研究者不应认定民众对民主有错误认知，而应分析其给出的含义为何以及为何如此界定民主。对中国政治文化情境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分析民众给出的含义。一些学者将“政府听取民众意见、回应民众诉求”视为民本思想的表现。^①实际上政府听取民意、回应民众诉求是上述三种民主理念共同支持的做法，将其视为民本思想的表现不够准确。为了弄清楚民主到底为何意，笔者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持续的深度访谈，整体感受是：当民众谈到“政府听取民众意见、回应民众诉求”等词汇时，意指政治过程中民众的参与性和主体性，而不是对贤能或开明统治的期待。^②因此“政府听取民众意见、回应民众诉求”等回答应被视为社会主义民主话语的产物。反过来，从问卷和访谈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民主话语对民众民主认知的影响，“人民当家作主”一词被相当一部分民众用来形容民主。与此同时，民主在中文语境中可能意味着“民自己做主”，民众可能将其与自由等同，其原本含义发生改变。在中国的情景下，研究者可以尝试将民主替换成人民当家作主进行提问，测量民众的民主偏好和满意度，其测量更为准确，也因意思清楚可能收获更高的有效回答率。

四、总结和讨论

民主的测量长期以来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民主认知因涉及研究对象的主观理解和态度，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和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如涂尔干所言排除自身的“预断”，对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客观分析。^③在这点上，“假定—验证”思路往往没有意识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对民主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出现在将研究者自身的民主认知加于研究对象之上的做法，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和结论的可信度。韦伯提倡在理解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分析。^④“归纳—分析”思路对研究对象的民主认知进行充分搜集，在归类和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考虑研究对象身处的政治文化情境，而不是再次被自己的预断所支配。本尼迪克特曾言：用问卷调查了解一地民众的意见，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及的前提条件，即研究者熟悉本地生活方式。相比于研究对象的数量和覆盖性，对本地文化自身特性的认识具有优先性、也更为重要，否则问卷调查无法提供有效信息。^⑤

本文认为在民主认知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将政治文化情境带入进来。具体而言，首先，研究者需要进入研究地区的文化情境之中，了解当地哪些政治文化规范和话语可能影响民众对民主的理解，这里可以使用话语和文本分析；其次，研究者应该搜集和整理民众自身对民主的理解和界定，分析民主的含义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是否有所转变，实地调研和访谈方法最为合适；再次，在把握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了解民众的自身界定后，研究者在问卷中设计符合当地文化情境和话语体系的问题，测量民众的民主观；最后，研究者应对多种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在符合本地政治文化情境的前提下推敲民众回答的含义，同时用民众的回答检验哪一种政治文化规范更具影响力，实现集体和个体的相互印证。本文以中国为例，展示新的思路如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民众的民主认知。总的来看，政治文化情境的引入有助于研究者摆脱自身的预断乃至偏见，发现并承认政治意义系统的多样性。在对民主认知的研究上，这有利于增强民主认知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

责任编辑：王永平

① Tianjian Shi,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pp. 123-130;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9-140页。

② 访谈1, 2, 3, 河北唐山, 2014年；访谈4, 5, 江苏苏州, 2017年；访谈6, 上海, 2018年。

③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7、51页。

④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页。